

余一鸣:中年爆发的“驻校作家”



余一鸣中年发力写作,爆发力惊人 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牛华新 摄

余一鸣常说他是“业余作家”。这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。

其实他是更愿意做个业余作家。他曾有过很好的机会进入文学体制内,成为某名刊主编,一个实职的处级干部。最后还是作罢——

“我觉得写作这个东西不能专业化。作为一个专业作家,要靠写作来安身立命,你会很累,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压力,甚至可能从功利的角度去追求,然后影响你作品的方向。”

于是他继续呆在南京外国语学校做他的语文老师。他的很多小说,可以看见校园生活的影子,包括最近被外界称为“直击教改之痛”的“教育三部曲”,都是因为教师这个职业,为他提供了文学生产的可能。

但余一鸣的故事远不止这些。他是有过真正生活体验的人。年轻时下海经商、倒买倒卖甚至拿地盖房这些事他都干过。努力赚钱,为的是保留一个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尊严。

余一鸣一直挺努力的,努力工作,努力生活,现在,努力写作。

“我给自己规定每年10万字,至少写10万字!”脸膛黝黑的他,伸出短粗的五指翻了翻。

现代快报+/ZAKER南京记者 陈曦

余一鸣

作家。1963年出生于江苏高淳。1984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。现为南京外国语学校老师。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十余本。获人民文学奖、两届紫金山文学奖、金陵文学奖,获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《创作与评论》年度奖,获《中篇小说选刊》和《北京文学》双年奖。



扫码看访谈视频

1

余一鸣是土生土长的高淳人。高淳东高西低,东部是低山丘陵,西部是水网密集的湖区,独特的地势孕育了高淳三大产业:建筑、水运和螃蟹养殖。余一鸣赖以成名的“高淳三部曲”,就以这三大产业为题材。

在《不二》中,余一鸣写了一帮做建筑和房产开发的兄弟。这些同伴小学毕业或是初中毕业就被送到师傅家去学泥瓦匠了。余一鸣读高中,读大学,毕业后分到家乡中学教书,他们从县城到省城,一直劳务输出到科威特。等余一鸣从县城调到南京,苦于没钱买房之际,这帮兄弟几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开发公司和建筑公司。

他们都用怜悯的眼光看余一鸣:你上个大学那么苦,买个房子都买不起。不断劝他说,你那书别教了,到我公司来做个副总吧,余一鸣说,不行,要做就做董事长,他们没一个人愿意。

但是他们不放过他,要买地,要接大工程,都拉着余一鸣出席。他们是他们村里的文化人,在南京最好的中学教书,还能写小说,最主要的还能帮他们审查合同或者搞楼市策划什么的。其实他们是想帮他——在南京买房,女儿出国留学,教师那点收入指望不上。

余一鸣的外公做过大队支部书记,上世纪70年代末,村里最早的建筑队就是外公拉起来的。村里孩子考不上学,想去建筑队,外公点个头就行。这帮兄弟还是念这份旧情。

余一鸣常叹,那年要是考不取大学,就到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去学个工程预算,估计现在也发大财了,结果他考取了,命运改变了,就成了穷人。

要不要辞职去盖房?余一鸣有过动摇。从内心来讲,这不是他真正喜欢和追求的,传统观念作祟,也不太看得起经商这行当。“就连我那些亿万富翁朋友自己也说——讲到底我们就是个包工头哎”,所以他还是决定保留教师这个清高的文化人身份。

至于钱这个东西,衣食无忧,能给家人带来保障,他觉得就够了。

2

上世纪90年代,余一鸣从镇上调到高淳县二中做教导主任,当年的小兄弟们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大显身手,个个赚了个盆满钵满,迅速成为有钱人阶层。余一鸣业余做生意赚了一些钱,成为老师里最早买商品房的人。

有一年暑假,余一鸣跟着船跑了两个航次,从湖北荆州打沙,再到上海龙华卸沙。不是为了体验生活,而是他近20万元借在船上。上船是为了追债。

那是90年代末期,“金陵首富村”武家嘴带头造船,高淳的民间造船业搞得轰轰烈烈火热朝天。有一种说法,长江上跑的船,有三分之一是高淳的。周围人都在造船,余一鸣不少同事和朋友辞职去造船。一方面是卖,卖不掉就自己跑,正值搞基础设施建设,黄沙价格好,赚钱比较容易。

由于是民间造船,也就存在大量的民间借贷。余一鸣赶潮流倒卖钢板和柴油机,专为造船提供物资设备,造船的人钱不够,可以先欠着。他上的那条船,造价1500万元,至少借了1000万外债。

跟着船在长江里跑了二十天,余一鸣经历了种种在岸上想不到的磨难,也目睹了财富背后付出的巨大代价,逃债、死亡,有个别家庭随船沉入长江,没逃出一个人。



写作这个东西不能专业化。靠写作来安身立命,你会很累,会有很多的压力,甚至可能从功利的角度去追求,然后影响你作品的方向。

“除了自然因素,也有这个民间造船质量不能保证。而且当时治安也不好,江匪抢劫杀人,水上公安还比较少,管理上各自为政,你湖北打击,他就跑到安徽跑到江苏,流动的嘛。现在他们应该早就上岸改头换面成立公司了,原始积累完成了嘛。”

时过境迁,只要还健在的那批船老大都成了富人。小说《人流》里拴钱的原型——欠余一鸣钱的那位船老大,现在拥有了一艘万吨轮。年纪大了,船交给了儿子,他在岸上经营一个沙场,收入颇丰。

偶尔,他们能在一起喝顿酒,余一鸣发现,他不再是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民,也不再是那个说话做事爽直的血性汉子,每说一句话,都要想半天,眼珠像雷达转来转去。只有酒喝多了,他才会放声大哭,用手拍打着余一鸣的肩膀,说,老余,老余呵。

同样是腰缠万贯,同样是离开故土闯荡成了富翁,船老板们不同于岸上的富豪,他们谨慎,警惕,不凑热闹,不惧生死。余一鸣将他们的秘密昭示于文字,常常心有愧疚。

3

2002年,余一鸣调到南京外国语学校。在这所全省最好的中学,他不敢懈怠,三年发表了90多篇教育教学论文,把所有的语文教学核心刊物都发了一遍。就像当年做生意一样,他要以此证明自己已有这个能力。

2007年余一鸣顺利评上“南京市学科带头人”和“江苏省333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”,下一步照例该冲“特级教师”了,可他就此打住。“我不想赶热闹,什么事争的人多了,我赶紧掉头。”

一方面,那些年在朋友帮助下,余一鸣无需再为钱发愁,他并不在乎评上职称后多那几千块钱;另一方面,2009年女儿出国留学后,他觉得浑身轻松,认为可以去做真正喜欢的事。

“说到底还是这个东西在我心里分量不够。这期间我接触到了一些语文教学大师,觉得有水平的不多,当然他们态度很端正,但是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,如果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人,去跟他们拼搏一下还觉得有意思。”

从2009年开始,余一鸣专心投入写作,他给自己规定每年至少写10万字,仅今年以来,他就发表了三个中篇、三个短篇,还卖掉了两部小说的电影版权和《人流》的电视剧版权,后者将拍成一部13集的网剧。这些都是意料之外的收获。

“人只要努力,踏踏实实去干,前面所经历的一些磨难,它最后都会变成回报。”余一鸣说。

2015年,余一鸣正在黄山装修房子,突然接到省作协电话,说要调他过去,安排个正处级实职。余一鸣是事业编制,副高职称,能给这样的安排,作协跟组织部门做了很多工作。

刚开始余一鸣挺开心的,心想,这辈子教师也当过,生意也做

过,现在当个官也不错,那就去吧。但转念想了又想,到了新单位,这个会议那个接待肯定躲不掉,相对来讲,还是呆在南外自由。“我是非常感谢的。如果三四十岁,我肯定去了,但我都五十多岁了,心态已经不同了,还是留点时间写东西吧。”

余一鸣说:“到了这把年纪,做什么都遭嫌弃了。文坛也一样,同龄人都在文坛有了坐椅,被热捧的轮到70后80后90后作家,我在尴尬的年纪选择了尴尬的事业。但写着写着,我已没有别的喜好了,别无选择,只能埋头往下写。”

4

余一鸣的主业是教学,业余写小说,二者互补调剂。

他认为写作这个东西不能专业化,“要靠它来安身立命,你会很累,会有很多的压力,甚至可能会从功利的角度去追求,然后影响你的作品方向。另外,如果成为专业专家,你没有真正的生活,采风那些其实都是蜻蜓点水。”

做老师35年,余一鸣对教育界种种人事、关系烂熟于胸,对各色人物因入学、招生、评职称、有偿家教、出国留学、教育产业化等等而引发的日常生活变动、心理与精神变化也非常谙熟。

作为坚定的现行教育体制的批判者,他近年创作的“教育三部曲”《愤怒的小鸟》《种桃李种春风》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,现实性极强,也相当尖锐。这些故事都取材于生活,不能让人对号入座是他的基本方针,小说毕竟是虚构的,小说家应该有这个能力。

身为作家和中学教师,余一鸣很希望把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热爱传输给孩子们。

他认为,小说对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,对人的情感和品质的养成十分关键,可是现在的中学只是把语文当作一个学科,忽视了人文修养的力量。而应试教育主导下的教学方式更是肢解了汉语的美,作为语文老师,余一鸣感到痛苦和无奈。

出于“对服从于高考作文要求的模式作文的深恶痛绝”,余一鸣在学校开了一门“个性化阅读和创意写作”的选修课。“明确讲这个跟考试两回事!”

余一鸣要求孩子们进行“批注式阅读”,看完以后边上的批注要批满,可以是思考,可以是赞美,可以是批判,也可以是联想。敢于发表观点,保留思想的利器,个性阅读就是要形成这种阅读习惯。学习结束,交一篇小说上来。“我觉得这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,到今年已经搞了七八年了。”

余一鸣坦言,好在南外没有高考压力,学校每年也就一二十个学生参加高考,如果有高考压力,他恐怕也会离开。

去年,余一鸣到哥廷根大学做了两个月的驻校作家。一去他就跟德国人讲,他是个中学老师。他们都笑说,萨特也是我们的高中哲学老师,中学老师在我们这里不丢脸。